

DINGGU JINGJI JINRONG LILUN WENJI

丁鹄经济金融理论文集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丁鹄经济金融 理论文集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天朗

责任校对：潘 洁

责任印制：尹小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丁鹄经济金融理论文集/丁鹄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5

ISBN 7 - 5049 - 2742 - 2

I. 丁… II. 丁… III. ①经济学—文集②金融学—文集
IV. ①F0 - 53②F83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2262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发行部：66024766 读者服务部：66070833 82672183

<http://www.chinafph.com>

邮编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宏文印刷厂

尺寸 140 毫米×203 毫米

印张 17.5

字数 453 千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0.00 元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丁鹤，江西省金溪县浒湾镇丁家村人。生于1916年9月24日，卒于2000年6月20日，享年84岁，艰难地走完了一生。他自叹：“空有远志却一无所成”。嘱咐死后尸体交给医院，任其处理，对人民还会有点益处（他死时我感情过分冲动，没有这样做，）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生前他的学生提过，把他的学术思想整理出书，他不同意。他写东西从不留底稿，平时随笔写下些言志抒情小诗竟也没留下，决意“赤裸裸的来赤裸裸的去”。

他逝世后，徐诺金同志（他带的博士）再次提出，把他写下的东西收集出书。我考虑：他没有不朽的惊世鸿文，也没有做出什么大贡献，只是零零星星写的东西，在社会上还是有过一些反映。有的被收录于相关论文集，有的得奖，有素不相识者（多是分支行干部和青年学生）来信，或称赞他的文笔，或赞同他的观点，或提出问题（凡提问题的他必及时回信）。于是，根据我的记忆，从他零乱的遗物中，找出若干篇，他自己曾认为学术性较强，有他个人的新见，至今仍有学术参考意义的集成此书，以谢社会。

徐诺金同志为出版此书，付出大量心血和劳动，王素珍同志（他带的最后一位博士）为寻找他过去的文稿尽心尽力。对他们这份对丁鹤的深厚的师生情谊，深表感谢。

吴芳兰 2001年4月5日

生平简介

丁鹄家境贫寒。初中二年级时，父母相继去世。大哥多病，无力承担抚养弟妹（还有一弟一妹）重担。他就靠亲友零星济助和利用假日和假期干点临时工作（如抄写和家教）挣点伙食费。没有钱买课本，就借同学的书摘抄或全抄下来学习，学费则靠自己成绩列前三名而得免，这样熬到高中毕业。对前途正处于一筹莫展时，巧遇一乡亲商必惠老先生慷慨资助 40 元，去了武汉（当时江西没有大学，要考大学去武汉最近最省钱），报考也只能报考武汉大学经济系梁士诒贫寒助学金。他本来对物理数学兴趣浓厚，只因没有钱才读了武大经济系。幸被录取，每年有助学金 200 元，加上江西省政府，因本省没有大学而对在外省读大学的一律每年补助 100 元。他领得助学金后，立即买了一部精装古籍，烫金字落款，表示恭敬，回赠商老先生报答济助之恩。对自己仍本节省原则，开始承担抚育未成年的弟弟的责任（妹妹已夭折），经常接济大哥的医药费用。1939 年大哥病故，遗下妻儿四人全由他抚养，直到能自立。

1939 年大学毕业，毕业论文得导师杨端六教授及其他教授的好评。杨的评语中有：“本论文作者读书得间，思考甚深，可谓已进入研究阶段。作者在学术界的前途极有希望，此予所极引为欣幸者也。”这个评语，对他日后用志于毕生研究有一定影响和鼓励。旋即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的中央银行，入经济研究处做研究工作，本准备考庚款赴英、美深造，奈身染肺结核，只好作罢。安下心一边治病养病（以后身体一直不算好），一边做

2 丁鹤经济金融理论文集

研究，凭自己实力提升较快，1948年初升为一等专员（相当于教授）。负责起草过《中央银行法修改法》草案，并以专家身份列席立法院立法委员小组会。

他秉性刚正，处世忠厚、纯真，爱国爱民。他对西方名家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读得很多，知之甚深。但不惟书，从不生搬硬套，而要经过缜密思考，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意见。1941年在重庆热烈讨论上海游资内移问题时，针对当时情况，写了《论游资内移与生产因素最少原则》一文，做了详细分析，阐明利弊，提出了生产因素最少原则，认为经济危机是源于生产结构的错乱。1947年知名大学者吴大业教授引进希克思《价值与资本》书中的一个新论点，推演了一套“负号生产论”。他写了《评“负号生产论”》一文，在理论上力辟其误，指出生产必须有个更高目标——国计民生，发表后吴教授反映很好。

学生时代，他不仅是个刻苦好学的学生，也是个热情的爱国青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参加汉阳门露宿，参加险渡长江，并在武大学生救国会担任工作，被列入黑名单，险遭开除，幸得教授们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与金溪籍同学相约回乡组织抗日宣传工作。1941年以后，和地下工作者陈逊同志来往密切，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1946年以后更得经济研究处处长冀朝鼎同志（原以为他是国民党的高官，上海解放后，他以军代表身份参加接收中央银行，才知道他原是中共地下党员）暗中帮助和培养（也在暗中观察），即认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拥抱社会主义理想，等待解放。他替无锡地下报纸书店募过捐（陈逊同志的关系），参加上海文汇报（当时的进步报纸）座谈和上海地下党召集的秘密座谈会，讨论上海解放后的金融问题，并负责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后银行制度的意见，还常替冀老写对中外报刊的发言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由冀朝鼎同志推荐给中国银行总管

理处的军代表兼总经理龚饮冰同志担任秘书，做了一些对国外行的争取工作。后任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负责国外金融调研、分析，收集有关外贸、金融信息资料供中央决策参考，甚得信任。

1955年下半年，陷入人民银行“三大案件”，先是诬为有政治嫌疑，留行隔离审查三百多天找不到事实根据。恢复工作后，他即要求调到金融研究所专做研究工作。1957年在中科院召开的社会科学界座谈会上，批判了凯恩斯的“乘数论”，发表于1958年《经济研究》。1958年在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座谈会上作了“美元是纸老虎”的发言（若干年后，约60年代中期得到证实）。不料1958年下半年总行进行反右补课时却无端把他定为右派，后下放山东菏泽中心支行。“文化大革命”中，1970年8月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作为反革命逮捕，在看守所关了25个多月。可庆幸的是“天意怜幽草”，还健康地活下来了。更可贵的是在各种恶劣的环境里，他没有沉沦倒下，忍辱负屈、自强不息，顽强地站起来。1973年得知（《价值与资本》一书作者希克思）获1972年诺贝尔奖，激发他要对此书进行再批判。（1947年的“评‘负号生产论’”一文已对此书有过批评）在那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既无从容的时间，又毫无资料，全凭他的记忆和扎实的基础，写成了“对希克思《价值与资本》的批判”一文，得北大经济系主任樊弘教授的好评。可是他当时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没有出版的机会。后来希氏本人对此书也作了批评，他就无意整理出版了。

1978年，蒙杨培新同志提议调回总行金融研究所任外国编译室主任，以惊人的毅力将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把已成过去的不幸视为是历史给开的一个玩笑，而付之一笑，一如既往，鞠躬尽瘁，积极从事和组织外国金融研究。1981年辞去外国编译室主任职务后，参与研究生部的创建工作和教学工作。把研究和教学融为一体，而偏重于研究为教学服务。1981年评为研究员，1986

4 丁鹤经济金融理论文集

年评为博士生导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兼任成都西南财经学院教授，《世界经济年鉴》编委会委员，《国际金融研究》顾问，“国际关系研究会”副会长，“国际金融学会”理事，南开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他认真履行一个“经济学人”的责任，为国分忧。经常提些个人看法，供领导参考。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篇：1987年的《向慢性膨胀论者进一言》，本是向行长们提供研究的内部意见，略加修改，发表于《金融研究》。1989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会评委会评审小组特别推荐并评为1989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获奖文章。1988年写的《对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就应保证贷款吗》一文，本来只发送至中央领导和总行行长们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室等有关领导和单位，后由社科院院长室转发至较大范围。1989年的《重振信用，刻不容缓》，刊于内部刊物《金融研究报告》。1995年的《对外汇政策的两点看法》，刊于《金融研究》，1998年选入《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集》。很遗憾1983年冬患支气管哮喘，生命垂危，虽得救治，但始终未能根治，身体一直不好，兼之年事已高，继续研究已力不从心，未能完成他计划中的应用马克思理论符合中国新情况的“生产决定论”的研究。他衷心企盼不久的将来，从中国土壤里出现崭新的符合中国特殊情况的经济学。

吴芳兰

2001年3月20日

目 录

一、论游资内移与生产因素最少原则	1
二、中国国民所得的五种估计	23
三、评“负号生产论”	81
四、凯恩斯“乘数论”的批判	110
五、美元的危机——揭露美元纸老虎的真相	131
六、论通货膨胀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系	149
七、谈谈储蓄存款、企业存款和现钞的两面性	172
八、读西方通货膨胀史杂记 之一	180
九、读西方通货膨胀史杂记 之二	186
十、论“国际化”通货膨胀	189
十一、谈谈储蓄中的一个理论问题	200
十二、对金融体制改革的几点认识	213
十三、苏联经济体制的最大缺点是没有竞争 ——从隐蔽式的通货膨胀说起	226
十四、评凯恩斯派和货币学派	235
十五、再读凯恩斯《通论》有感	253
十六、货币不再是价值标准吗 ——金融管见之一	279
十七、什么是货币？ ——金融管见之二	289
十八、扑朔迷离的货币流通速度 ——金融管见之三	297

2 丁鹤经济金融理论文集

十九、从金融看体改的宽舒环境	
——金融管见之四·····	304
二十、通货膨胀背后的两点破坏性	
——金融管见之五·····	311
二十一、要为企业家的算盘着想	
——金融管见之六·····	315
二十二、向慢性膨胀论者进一言·····	322
二十三、我的反通货膨胀观·····	331
二十四、有“效用函数”吗	
——评经济学上数学	
方法的误用兼与祁晓东同志商榷·····	347
二十五、对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就应保证贷款吗·····	353
二十六、重振信用，刻不容缓·····	357
二十七、对外汇政策的两点看法·····	359
二十八、希克思《价值与资本》的批判·····	364
爸爸的教诲·····	547

论游资内移与生产 因素最少原则

一

1940年五月时，私感一般论上海游资问题者，每主上海游资应尽量内移，而心窃疑之，乃为文投登重庆大公报。^①文中曾有言曰：“上海所过剩者非实质资本而为货币资本，而内地所缺乏者非货币资本而为实质资本。”又因感内移之非计，且不可能，兼之上海游资之泛滥，未始非投机猖獗之结果，遂极力建议政府采用法定存款准备制，“使货币资本减少，以削弱商业活动之势力”。八月间，幸有此项法令之公布。在未公布以前，笔者尚妄冀引起时贤对此问题作明晰而热烈之讨论，复又着手另篇，专作上海游资全盘问题之理论论述，嘱稿一月，而法令已见公布，私心良慰，非敢以为有此则游资问题即可完全解决，实觉当前对游资之初步措置，非此莫属也。斯文既成，蒙经济汇报登出。^②后十一月间，大公报所登诸专家座谈会之讨论记录，对游资之内容与内移之意义，详为解释，无意间使笔者领教不少，^③而当时时贤之见解与笔者相合者，似亦有之。本年以来，由于事态之演

① 载1940年6月14、15日重庆大公报，题名：“上海游资问题与存款准备——建议政府迅即施行法定存款准备制”。内中关于库存比率之计算数字有误。

② 载1940年9月16日经济汇报二卷五期，题名：“上海游资问题”。

③ 1940年10月16日大公报，经济座谈会：怎样吸收上海的游资。

进，内地社会一般人士之见解颇有改变，咸认游资内移，应有分寸，但港沪人士则仍不乏作囿囿之主张者，即主张有分寸之内移者，似亦尚未能将其理由充分论述，笔者不学，未得其解，爰有斯篇之作，非敢饶舌，乃以真诚求教耳。

二

何谓游资？笔者曾谓其在平日之普通含义，为“有投机之意，尚无投资对象，不滋生利得之闲散资金”。但在此战时，因投机之资金更为吾人所注意，而此种投机，就社会立场言固属有害无益，但就私人营利立场言，究不失其为投资，于是为“正名”起见，笔者复谓上海游资问题实资金过剩问题，而过剩资金则概括未使用及已使用而不正当之资金。所以故作此种特殊解释者，无非欲使“游资”一词存其原始之意义，今一般既皆认在投机市场活动者为游资，自以随从众议为宜。换言之，游资者，从社会立场言过剩之资金也。然则何谓“资金”？资金之界说甚多，若解作英文中之 Capital，则 Capital 一字之意义，在经济理论中已有纷歧之争议，实未便一一辩析。不过就本题言，则有以为资金具有种种形式，如货币、证券、生金银、外汇、或银行存款者。^④亦有以为应专指货币与信用者。此二解说范围虽大小不同，然各有其观点。就前者言，似系以个人营利或财富蓄积为观点。私人营利资本与财富蓄积，尽可不采货币形式，而视各人之流动优先欲^⑤而有种种不同之方式；或为股票，或为债券，或为债权，或为定存，活存。忆 Mr. Curtis & H. Townshehd: Modern

④ 1940年10月16日大公报，经济座谈会：怎样吸收上海的游资。

⑤ 此系采杨蔚：论游资之性质及其利用（财政评论六卷二期，1941年8月）对 Keynes: Liquidity preference 之译名，笔者原译为流动优先感（见本书第1页脚注②），但“欲”字较“感”字更可尽原名词之意义。

Money 中曾将各种方式依流动优先欲列一顺序，凡此种皆可视为该所有者之财富，或营利资金。此种观点，如用一般货币理论之讨论，自称允当，且未尝不可视为资金之正当解释。然窃以为在指责游资之罪恶时，一般人似从二说。社会中流行之时髦成语有曰：“游资充斥，物价飞涨。”使物价飞涨之游资，非指货币资本乎？最近如实业界潘仰山氏有言曰：“夫物价之上涨，虽属物品与货币两种数量，互为作用；然以游资之游来游去，今日游于商品，明日游于外币，后日游于地产，而其结果物资数量并不增多，而物价数字却日在增高。”^⑥ 此处游来游去之资金，又非货币资本乎？苟读者愿细细检读去年十月前各杂志报章关于游资论文及游资罪状之记载，恐无人能否认当时一般（几无例外）所谓游资，有意无意间皆被指为货币资本。笔者在去年试论此项问题时，对于资金未尝无正当的广义的概念，且曾就所谓国际资金移动之“资金”，与经济原理上之“资本”比较良久，最后仍觉依从众见，给资金以新的含义时，比较更可针对问题之核心；此笔者过去所以故意不对游资之“资金”下一定义，而径视为货币资本，且有时于“游资”下再注以“货币资本”之原因也。然则为何资金解作货币资本时，则更可针对问题之核心？考过去游资问题之发生，实因物价汇价之狂涨。若资金乃指私人营利资本之全部，则游资决不至犯此罪恶。何则？夫公债、外汇、生金银、货币等固皆可为一人之营利资本，然就社会之价格关系言，则分居于一分子式之上下两方，而 Money Market 之形成，亦即基于货币资金与其他形式资金间之此种对立。必有此种对立，始能产生金融市场及其他市场中之价格；亦惟有此种对立体分子分母变动程度之不一律，始有外汇、公债、标金、金赤、股票、棉纱等价格

⑥ 西南实业通讯四卷三期，（1941年9月份）潘仰山：游资引用与工业建设及税则奖掖之连环性。

之涨落，故吾人苟以所有私人营利资本之绝对值相加，所得之和，非惟就该社会整体言毫无意义，^⑦且因不能显出此种价格关系之故，复未能表明游资成问题之原因所在。夫使一般谈虎色变之游资问题，即价格关系之一也。反之，苟吾人转而注意上述对立体上下两部分之比较变动，则问题之严重性至为明显。此次所谓充斥为害之游资，当属货币资本之一种，而非外汇、公债、生金银等居于分子式另一方之因素。由是观之，视游资为货币资本，在方法上实较直截了当也。此外近数年来之美国，颇感过剩资金之难于处置，其所生问题之性质与今日吾人所遭遇者无殊，而彼国人士径以“Idle Money”称之，足见其为一货币资本问题无疑。^⑧

三

至于游资之来源，增加之原因，及其与投机之关系，内移之可能性与得失等等，笔者曾在拙作“上海游资问题”中试加分析，一般对以上各点之意见，要以对内移之可能性一部分最为一致，而对内移之得失则最分歧，兹即就此一部分之各种意见，试举例而论述之。

主张游资内移者，似有两派主张，其一主张囿囿内移，不鉴别资本之性质；另一则主张，仅移入实质的资本，而以为可收解决游资问题之效。作第一种主张者，其言论似又可分为以下三种：

⑦ 今日估计上海游资数量者，似即如此计算，其不当，杨蔚氏已辨析之。见本书第2页脚注⑤。

⑧ 游资之界说，种类近来甚多，繁简不同，然除“资金”所指范围外，皆与笔者所谓未使用及已使用而不当之资金，亦即就社会立场而言过剩之资金相类似，故不赘。

第一种言论以为上海游资充斥，弃之可惜，而后方则正苦资金短缺，故以有余补不足，非惟可以安定上海之市场，且可开发内地之实业。^⑨

第二种言论以为法币信用之维持系于汇价，而汇价之维持则又系于金融市场之紧缩，故须游资内移。^⑩

至于第三种，则以为上海有游资者已多移转目标于货物之囤积，故上海之物价上涨；上海之物价上涨，必影响后方物价之高翔。为求直接平抑上海物价，间接有助后方物价之平抑起见，应奖励上海之游资内移。^⑪

第一种言论之错误所在，自极明显。即“未能分别货币资本与实质资本之性质，及误认地域间资金之偏在，为目前金融问题之症结。唯其未能区别货币资本与实质资本，故将上海所多余之资金与内地所缺乏者混为一谈，唯其误解地域间资金之偏在，故以为应使上海之资金流入内地。殊不知上海所过剩者非实质资本而为货币资本，而内地所缺乏者非货币资本而为实质资本。云货币资本，则内地资金之充斥，曾不亚于上海，内地银行盖亦苦其资金无正当出路矣。云实质资本，则劫后之上海，亦同感缺乏，或其程度稍逊耳。”^⑫

至作第二种言论者，自有其独特之观点。我政府过去，亦即根据此种观点，而采禁止法币外运，紧缩上海市场之政策。苟吾人先有维持一固定公开汇率之大前提，则此种措施，当属不可少

⑨ 此乃若干港沪实业金融家之见解。

⑩ 本年10月28日上海×××××载平准基金会当局决定之三项方针，其一××为消灭上海（黑市后？），××××上海游资内移。（原件中字迹比较模糊，××表示无法辨认的字，带？的括号内是猜测的。下同，编者注）

⑪（掄？）：（冻？）结后游资内移之重要性，见中央银行金融通报十二卷十三期（9月24日）。

⑫ 本书第1页脚注①。

之举。然此种大前提，理论事实皆已证明其不真确，近年以来政府且已放弃之，此一前提既经放弃，则是否仍须紧缩沪市，吾人尚须作进一步之分析。笔者以为法币之信用，故不能否认其与汇价密切相关，但并不系于汇价绝对值之高低；在八便士时之法币信用，不见即较在一先令二便士半时为逊。亦不恃乎汇价之一成不变。就理论言，汇市经常居于波动状态，或高或低，略有缩落，决不至引起人民心理上之转变。尽管汇率之长期趋势向下，若其倾度不骤，而过程又相当平滑，使人民心理上不感深刻之刺激，则法币信用，必可依然如故；法币之信用原非价值尺度所可表示者。不特此也，法币信用之减退，其影响亦有分寸。吾人所惧者乃法币信用之动摇，所谓动摇，有二含义：其浅者则发生恶性之物价加速膨胀现象，其甚者则使法币丧失交易媒介之效能，由信用之减退至信用之动摇，其间相差，决非如吾人想像之接近也。总之，吾人虽可谓汇价与法币价值（指对内价值）互为因果，但汇价与法币信用，则绝无函数关系。兹再举事实以证之。自去年五二风潮过后，至本年七月二十五日以前，上海之汇市，其长期趋势向下：美汇由二十九年七月第一周（一至六日）之平均率六元二零三一五降至英美下封存令前一周（二十一至二十六日）之五元三一五，计缩去百分之十四，若与最低一周（本年四月二十八至五月三日）之平均率五元一五六二五相较，则曾降百分之十七。但斯时上海市况岂非安定而竟至于沉闷乎？然则汇价之下缩如何始可影响及法币之信用？就事实言，过去使法币信用受不良影响者，有二十八年六月与二十九年五月之放弃固定汇价之维持。此时人心所以恐慌之故，即缘汇价之狂缩。盖汇价狂缩，予人民心理以极大之刺激。唯其刺激，乃起莫大之恐慌。由是笔者须重复言曰：法币信用不系于汇价之绝对值，不恃赖汇价之一成不变，而有关乎汇价变动之缓急。于此吾人可知法币信用之维持要乎游资之内移否矣。笔者曾曰：

“若埠际收支有长久之不平衡，则久之可引起企业心理之改变，若埠际收支平衡，则纵然企业心理改变，亦不至形成如何严重之现象。……然就另一方面言，若企业心理自始未变，仅有法币流入，在相当长久之时间内亦无重大威胁。虽然埠际收支之顺差乃表示上海人民货币所得之增加，而法币之流入，又表示上海通货总量之扩大，其结果物价上涨，信用膨胀，产业扩充。但此时若无其他因素（银行降低利率除外）渗入，则反应必甚迂缓。吾人须知在反应之过程中有二中间机构：一为利率，一为社会购买力（包括外埠人民在上海之购买力）。利率之降低，若不由于政府之政策，其趋势通常缓慢；换言之，银行之库存虽高，但银行家不至即刻锐降利率，使信用额迅速扩充至相当于新增库存之程度，至于社会购买力之增大，其势亦甚缓，且企业家难于一时觉察，故企业活动之感应甚为迟钝。银行放款既然慎重，企业活动之感应既然迟钝，则前述法币流入之各反应，其迂缓自不待言，故曰在相当长之时期内，无重大威胁也。”

又曾谓：

“过剩资本非投机猖獗之单独原因。……上海利率既未低降，则依推论 Keynes 氏理论之结果，可见过剩资金并未使市场利率与资本边际效能之差额扩大。此种差额之所以扩大，实他种因素有以致之。”^⑬

证诸两年来之事实，所言似尚无错。可见上海通货之增加，虽为过去投机猖獗之必须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但其非其足够之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故可曰，上海汇价之急缩必先有充斥游资之存在，而游资充斥，未必即可招致汇价之急缩。^⑭ 或有

^⑬ 见本书第1页脚注②。

^⑭ 上海自五二以后之沉闷现象，吴承禧：现阶段上海经济之特质及其批判（财政评论六卷一期 1941 年 7 月）。